联合国 S/PV.8552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五五二次会议
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泰比先生	（科威特）
	比利时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伊波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赤道几内亚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
	法国	盖冈夫人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莱维茨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南非	范沙尔克维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亨特先生

议程项目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19-18173 (C)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主管维持和平事务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指挥官伦纳德·恩贡迪中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谢里尔·皮尔斯少将。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拉克鲁瓦先生发言。

拉克鲁瓦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在纽约这里举行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之际，在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我将作简短通报，因为今天会议的目的是让安理会听取部队指挥官关于其在执行安理会谈判和通过的任务授权方面的感受。

我们维持和平行动部队指挥官的这种聚会已成为一年一度的活动，对于维持和平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直接有助于我们努力执行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努力。为推动该倡议，他们将就许多至关重要的议题举行会议，这些问题从业绩到保护平民、从行为和纪律到妇女参与维和，不一而足。本周他们还将有机会继续密切关注在纽约这里——在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第五委员会和其他论坛——就维持和平问题进行的重大讨论，归根结底也就是我们为加强维持和平行动实地影响所作的共同努力。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4月19日突然去世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特派团团长兼部队指挥官弗朗西斯·维布-桑齐里少将表示哀悼。维布-桑齐里少将在复杂而艰巨的时期领导了观察员部队的工作，发挥了杰出的领导作用。他的去世是其在观察员部队和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的维和同事的沉痛损失。我要感谢安理会以及在此困难时刻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所有会员国。

我也希望通过军事部门负责人对所有效力联合国的人每天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安全理事会为今天讨论选定的主题，即与驻在国合作，是和平行动取得成效的关键。我相信本次会议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内容翔实，益处多多。安理会很快会听取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指挥官伦纳德·恩贡迪中将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谢里尔·皮尔斯少将的发言，我相信他们的经验对安理会的工作会非常有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拉克鲁瓦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恩贡迪中将发言。

恩贡迪中将（以英语发言）：我要不揣浅陋地作此介绍，谈谈与驻在国合作问题。

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苏丹共和国政局一直吃紧。我们看到革命导致政府解体和军人参政，以及随后总统被废黜，过渡军事委员会于4月1日取而代之的情况。6月3日事件致使关于向文官政府移交权力的过渡安排谈判破裂。

过渡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在九个月后举行选举。非洲联盟于6月6日暂停苏丹参与该组织的事务。正在努力使谈判重回正轨。这种情况影响到了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运作。

维持和平特派团与驻在国为圆满执行任务而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为了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协调，苏丹政府在外交部内设立了负责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单位，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设有喀土穆联络处，特派团团长在那里开展工作。

本介绍将涉及第2429（2018）号决议和部队地位协议分别规定的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与苏丹共和国在执行任务方面的合作与关系情况。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任务包括四个主要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关闭队部并移交民用、维持和平人员缩编以及最迟于2020年6月最终撤出。苏丹前政府和现政府向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保证，它将对特派团行动和顺利撤离给予配合与协助。作为过渡进程的一部分，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正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一道，在达尔富尔四个州执行国家联络职能，工作范围涵盖以下四个优先领域，即法治、为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找到持久解决办法、人权、能力建设以及立即向流离失所者提供服务。这些干预措施旨在应对达尔富尔四个州面临的挑战，在这几个州，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具有相对优势，可以在分析基础上共同开展工作。挑战包括土地、增强争端解决机制和保有权意识、族群间争夺水和其它稀缺资源的冲突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返回。

缩编、关闭队部和向政府移交的工作一直在按时进行。然而，当局以机构能力不足和需要保护设施为由，并未将所有队部都用于民用目的。最近，过渡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主旨是今后必须把队部移交给快速支援部队，该部队是军事部门一部分。这导致在情况进一步明朗之前，继续关闭和移交场地的工作暂时停止。

第二个支柱是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人员，并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总体上苏丹政府在执行这一支柱方面与特派团进行了合作，特别是在其控制地区。然而，在武装运动，特别是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控制的有限地区，准入遭拒，只有2018年9月除外，当时一个联合人道主义特派团成功看望并援助了东杰贝勒马拉山体滑坡事件的受害者。苏丹政府以无法保证维和人员的安全为由作出拒绝。

第三个支柱关系到在苏丹政府和未签署文件武装运动之间进行的调解。在前政权下，两个未签署文件的运动和政府签署了谈判前协议，而一个武装运动仍未作出承诺。必须指出，过渡军事委员会呼吁所有武装运动参加全国谈判。不过，目前的政治局势导致这一进程停滞不前。

最后一个支柱是支持调解族群间冲突，包括解决根源的措施。虽然作出了巨大努力来促进和平共处，但作为达尔富尔冲突核心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决。实际上，这是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它原因则是不安全和缺乏基本服务。

我现在谈一谈《部队地位协定》，《协定》是维和人员行为以及特派团与东道国关系的指南。有三个主要合作领域。第一是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提供房地和设施，供其驻扎和开展业务。值得称赞的是，苏丹政府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提供了大片场地，用于建立队部和超级营地。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当地社区一直要求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为他们的土地提供赔偿，而不是与他们的政府打交道。

第二，《部队地位协定》规定，混合行动在该国境内执行任务时享有行动自由。如前所述，苏丹政府总体上允许其在控制区内自由行动，包括跨州飞行，但以安全为由拒绝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进入武装运动控制的地区。

最后，苏丹政府有义务在特派团团长提出要求时保护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资产和设施。最近，西达尔富尔的朱奈纳超级营地在移交过程中遭洗劫和破坏，证明履行这一义务具有挑战性。在那次令人遗憾的事件之后，特派团和苏丹政府正在共同努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最后，我们认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苏丹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是诚挚的。只要存在信任和政治意愿，我强调的几个倒退是可以纠正的。苏丹当局已保证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合作并支持其行动，包括根据第2429（2018）号决议，为混合行动顺利撤离

提供便利。与会者重申，与东道国和其它伙伴合作是成功执行授权任务的关键所在。信任和政治意愿是合作的关键因素。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恩贡迪中将的通报。

我现在请皮尔斯少将发言。

皮尔斯少将（*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借此机会在安理会谈与东道国合作的议题——在这个议题上，我可以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长期以来的使命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联塞部队自成立以来，安理会就授权其尽最大努力防止战斗再次发生，并在必要时为维护和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恢复正常状态作贡献。几十年来，特派团成功履行了这一授权，其军事部门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80公里缓冲区内及其周边维持了稳定的军事环境。

我们努力预防出现紧张并在局势升级之前化解紧张，还在双方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在它们之间进行联络，这些努力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当前时期的不确定性和该岛当前的政治氛围。联塞部队正是通过这些努力，为创造有利于成功解决进程的环境做出了贡献。

谈到目前的议题，即与东道国的合作，作为联塞部队军事部门负责人，我在这方面的合作主要是与敌对双方部队进行合作，合作总的来说是建设性的。自今年1月履职以来，我本着专业化、共事合议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多次与我的对口方会面。我的接触计划强调互动应因人而异、定期进行，其基础是公正、公开和透明原则。即使在关系紧张的时候，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也是我的最高优先事项。

除我个人的接触之外，联塞部队在各个层面与敌对双方部队对口方保持日常接触，以防紧张局势升级。自2017年11月对联塞部队实施战略审查以来，特派团通过与我们的警察和文职部门密切协调，作出了更强有力的接触和联络努力。我刚才提到的指导原则是这些互动交流的基础，在各级——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得到运用。

尽管多年来联塞部队军事部门与敌对双方部队建立了总体积极的关系，但我们的合作并非没有挑战。停火线沿线违反军事现状的行为趋于增加，敌对双方部队的立场明显更加强硬，可能是该岛政治局势的映射。

我要详述一下具体的关切领域。

首先，联塞部队在缓冲区的权威经常受到挑战。安全理事会在关于联塞部队的最新决议（第2453（2019）号决议）中回顾了联塞部队缓冲区内的授权，对停火线沿线违反军事现状的事件增多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和有关各方尊重联塞部队在缓冲区的授权权威。然而，我遗憾地指出，实地迄今没有任何改善。

同样，尽管安全理事会多年来一直进行敦促，但双方都没有接受2018年备忘录或其1989年前续文件，备忘录是缓冲区内联塞部队行为规则方面的重要指导文件。因此，就在我的职权范围，即军事领域内与双方合作而言，存在很大的改进余地。有鉴于此，我们再次请求安理会也本着“以行动促维和”的精神给予支持，敦促双方听从我们多年来的呼吁，与联塞部队就执行备忘录展开合作，并尊重我们在整个缓冲区的授权。

关于所讨论议题，具体到塞浦路斯，如安理会成员所知，联塞部队与塞浦路斯共和国签署了部队地位协定。同时，与塞浦路斯土族社区的合作，包括在军事和其他业务事项上的合作，也至关重要。我们继续与所有相关行为体密切接触，以确保合作最优化。

最后，公正执行联塞部队的任务使我和军事部分能够有效维持军事现状，防止军方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并确保缓冲区内及其周边的平静和稳定。公正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项基本原则，秘书长提出的“以行动促维和”议程最近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此次重申具有重要意义。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皮尔斯少将的通报。

我提醒各位同事，举行本次通报会的设想旨在尽可能保持互动——与部队指挥官的问答环节是其主要的价值所在。因此，为了利用这一机会，更多地听取来宾的看法，我鼓励安理会成员作简要发言，把重点放在问答环节上。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莱维茨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保证尽可能言简意赅。

首先，我要对弗朗西斯·维布-桑齐里少将的辞世表示哀悼，并借此机会向所有勇敢的蓝盔人员——那些不幸地有时为和平和我们服务而献出生命的男子和妇女——致敬。

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这场互动式辩论会是一次非常有益的会议。今年的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非常及时。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维持和平。就在今年3月，我们举行了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会议强调了维和行动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和困境。

其中的一个挑战涉及改进培训和能力建设。我们必须承认，维和人员缺乏培训，直接影响任务的执行。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以便提供一切工具，使指挥系统的各级维和人员能够改善特派团人员的实际表现，加强他们的安全。不用说，维和人员的安全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也是特派团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效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事实上，任务授权是今天审议的议题之一。安理会已讨论重新评估各特派团的组成和任务的重要性，特派团的任务必须基于局势以及在实地将其付诸执行的能力。部队指挥官必须根据当前安全情况灵活使用各种工具，主动采取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想问部队指挥官几个与其所在的特派团有关的问题。我认为，这应该也是他们向我们这些安理会成员传达信息的机会。

我向两位部队指挥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如下。他们认为，目前的任务授权是否允许部队指挥官积极采取行动，如果情况需要，是否允许他们主动采取行动，以完成特派团的任务？如果不允许，那么阻碍特派团顺利执行任务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第二，鉴于我们关切逃离冲突区的人的处境，我想问谢丽尔·皮尔斯少将，她是否在缓冲区内遇到难民和无证移民带来的挑战？

我还想问恩贡迪中将以下问题。喀土穆目前的局势对他所指挥的特派团有何影响？在苏丹全国暴力和不安全局势恶化的背景下，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暂停向苏丹军方移交流离失所平民营地。他对此有何看法？

最后，我谨再次表示，我们深切感谢部队指挥官所做的工作，感谢他们出席今天的会议，介绍他们的经验。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予指导，将今天的会议限于提问。我将这样做。在我们波兰同事发言后，我必须说，他提出了一些我想问的问题。因此，主席先生，鉴于你将最后一个发言，我认为你将经历一个困难的时刻，真的必须想到一些新问题。

我也感谢今天在座的部队指挥官。请允许我像波兰同事一样，向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服务的蓝盔人员致敬。我向在此过程中献出生命的男子和妇女致敬。我还请部队指挥官转达安理会对其部队的感谢，感谢他们在有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安理会听取部队指挥官介绍的实地情况非常有益，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他们会感到有能力和勇气全面回答所有问题，无需使用外交辞令。

关于我的问题，我想向两位部队指挥官或其中一位提一个一般性问题，即，在他们看来，在秘书

长改革和平与安全架构之后，总部提供的支持在实地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的第二个一般性问题涉及对改善特派团军警部门业绩所给予的极大重视。他们是否能够得到所需的数据，以便基于证据推动改进绩效工作？

接着波兰同事提出的问题，我想请恩贡迪将军具体地谈谈巴希尔总统被赶下台之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与苏丹当局之间的合作。我还想问他以下问题：朱奈纳营地发生抢掠事件后，开展了哪些总结经验教训的活动？他从中吸取了什么经验教训？我注意到，目前已暂停移交队部，当然，这是他说的。

最后，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皮尔斯将军提到了联塞部队在双方之间所做的联络工作。最新的任务要求建立一个双方直接接触机制，以解决安全和其他问题，这种机制在其他联合国特派团所在地区相当常见。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告诉我们建立这一机制的努力是如何取得进展的，如果没有取得进展，那么可能的障碍是什么。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举行本次会议，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的通报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部队指挥官令人极为感兴趣的通报。

首先，我也谨向为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男男女女致敬，向数千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致敬，他们每天代表着希望，为保护世界各地弱势民众做出贡献，并在他们奉命承担的各种复杂使命中推动预防、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进程。

我们认为，这次对话特别有意义。我们也仅作简短发言。联合王国代表谈到了我要谈的同一个问题，但是我会尽量从不同角度谈论。联塞部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建立各项机制和措施，以培养各方之间的信任，这有助于努力寻求一种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确保特派团与平民之间的积极互动，包括制订预防办法和最终进行调解，以及建立适合这两个群体的沟通战略。为此，我们要请皮尔斯少将分享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并询问她是否认为应当、或者确实必须将其参谋人员的能力纳入向部队派遣国提供的培训，或者是否能够立足于每一种情况的独特性，在实地掌握这些能力。

秘鲁作为一个部队派遣国，坚决支持秘书长重视蓝盔部队的安全保障。除其他措施以外，我们认为，这需要就特定挑战进行培训并实施业绩评估，评估应当是为了纠正所查明的缺陷，而不是为了施加惩罚。就达尔富尔而言，当前出现了与侵犯人权有关的严峻局面，包括多起性暴力案，其中很多系政府自己的部队所为。在这方面，我们请恩贡迪中将说明，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帮助建立更好的渠道来与当地官方沟通，以解决这类严重问题。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感谢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指挥官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指挥官就其任务执行情况所作的通报。我还要和我的同事们一道，感谢所有维和人员在常常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恪尽职责，并缅怀那些为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人。

我要提出几个问题，但是在我提问之前，我要对我们大家熟知但是依然重要的维持和平工作谈几点意见。联合国一切维和行动的成功取决于维和人员与其驻在国当局及冲突各方日常进行的建设性互动，以及贯彻执行在东道国具有关键意义的特派团任务，而不是舍本逐末。

我们知道，东道国负有保护平民、建立政治进程、解决危机根源和促进冲突后重建的首要责任。我们认为，维和行动东道国有可能与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三方合作实现全面对接，这肯定会提高所涉机制的有效性。维和行动显然不应当取代东道国当局，而应当向其提供它们在危机处理战略的执行阶段所需要的援助，优先重点

应当是提高当局自身的能力，以避免冲突复发。正是在特派团能够与东道国政府实现可靠和有效合作的国家，维和行动才能够创造有利条件，确保全国和解和危机后重建。我想对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指挥官说一下，我们认为必须确保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顺利过渡，我们希望在计划于2020年完成缩编和全面撤出的背景下，在达尔富尔实现这种顺利过渡。

不用说，与提高维和任务的成效和确保蓝盔部队的安全有关的问题同过去一样重要。维和行动的成效直接取决于秘书处和实地特派团等各方执行各国关于维和问题的共识性协定的效果如何。正是这些协定体现了各国表示愿意履行的共同承诺。在这方面，我想提醒安理会注意，为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多斯桑托斯·克鲁斯中将关于改进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保障的报告制订的行动计划，仅应当在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商定的范围内实施。维和情报、信息收集和分析只能用于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和保护平民。滥用这些工具，包括为了政治目的滥用这些工具，有可能削弱对联合国维和活动的信任。为此，主席先生，按照你的要求，我要问一问各位部队指挥官，他们是否以克鲁斯报告提出的建议指导其活动，如果是这样，如何用这些建议指导其活动。

我们还要指出，安全理事会某些特派团的授权任务，包括联塞部队的授权任务，甚至在秘书处最后完成这份文件之前，就已经融合了业绩政策框架战略。该文件是否已经被纳入特派团的工作？我们希望在秘书处和特派团将其付诸实施之前，在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内完成所有必要的协调程序。本着伙伴关系精神，包括部队派遣国在内的有关各国都应当参加与此有关的讨论。我们希望联塞部队也以该办法为指导。

亨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各位部队指挥官所作的通报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今天着重谈谈东道国的配合以及维和业绩这两个问题。

的确，征得各方同意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核心原则之一，但是这项原则的基础是各方致力于政治进程。我们已经看到，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体现在秘书长的“以行动促和平”倡议和美国自己的维和原则中。维和行动必须支持实现政治解决，维和特派团必须得到东道国的配合。两者携手共进。维和特派团要有效执行任务，并成功配合旨在实现稳定和持久和平的政治努力，就必须得到东道国的充分合作，特派团人员在行动地区内必须拥有彻底的行动自由。安全理事会决不能放弃《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同时我们已经看到，当东道国决意为其设置障碍时，特派团在完成任务时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加。

美国借助“以行动促和平”倡议和一致通过第2436（2018）号决议，提倡注重维和业绩。确保良好业绩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向维和特派团问责。问责度较高的特派团能够更好地执行任务并提高联合国蓝盔部队在世界各地的公信力。第2436（2018）号决议明确指出，安全理事会需要更准确的维和业绩信息，以便作出更好的决策。从培训和能力建设到确保对业绩欠佳实施问责，我们不能就我们不了解的事作出决定。我们不能再接受“一切照旧”的做法，不公开坦诚地谈论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欢迎秘书长承诺实施一种综合业绩政策，但是任重道远。我们将继续同我们的伙伴一道努力，尽快全面执行第2436（2018）号决议。

此外，东道国必须拥护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工作的各项战略目标。如果东道国不了解和接受联合国的目标及提供的帮助，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东道国必须与联合国和部署在其国内的维和特派团合作。如果没有这种合作，维和特派团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或完成我们各项决议中所载的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任务。

有鉴于此，我谨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的通报人今天可否向安理会着重指出东道国以哪些方

式拒绝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斡旋，试图限制通行和出入自由？

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过渡军事委员会最近表示，打算从先前由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运作的队部撤出所有武装部队。这些队部将移交给谁，从后勤角度说，预计以何种方式进行这种过渡？

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我们知道，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对征得东道国同意的问题持不同看法。该问题直接给特派团带来何种挑战？

最后，美国向所有部队指挥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团队在世界各地继续服务和奉献。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互动会议，讨论一个尤为适切的重要问题，即与东道国合作的问题。众所周知，这是维和行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我还愿通过伦纳德•姆里乌基•恩贡迪中将和Cheryl Pearce少将，赞扬所有军事人员在常常极具挑战的恶劣条件下执行自己的任务。

我谨发表两点初步意见。首先，与东道国合作至关重要，是确保维和行动实现其目标的必要条件，当然同时要尊重东道国的主权，顾及保护蓝盔人员和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文职和军警人员的必要。其次，与东道国合作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载入维和指导原则的紧迫必要。这种合作意味着东道国和联合国既享有权利，也负有义务。在这方面，我谨强调三点主要意见，然后向我们的通报人提出与之相关的问题。

首先，必须征得东道国对部署维和行动的同意，这不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有其行动层面的目的。联合国同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对话至关重要，但是，还必须在实地开展蓝盔人员同东道国军警人员之间的对话。显然，这种尊重与对话是保障特派团成效、使之为当地民众所接受的一种手段。这种合作可采取多种方式，如交流影响平民和维和人员的各种风险与威胁的信息，或者协调行动，如果特派团任务授权对此做出规定的话。

在此，我愿向我们的通报人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对各自所属特派团在这两个层面即战略与行动层面合作的经验能够提出什么反馈？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东道国必须遵守其在部队地位协定中的承诺，因为该协议确保在东道国领土上部署的蓝盔人员享有通行自由和保护。任何情况下违反部队地位协定都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此进行监测，确保持续进行已部署的特派团同东道国当局之间的对话，以早期和尽快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知道，维和行动的主要授权任务常常是保护平民。尽管如此，东道国负有保护其民众的首要责任。维和行动可帮助有困难的国家保护其民众免遭某种特定威胁，但是维和行动不能代替东道国，后者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其民众，包括通过警察、军队以及法律系统，系统地起诉暴力侵害平民、侵犯民众权利的人，即使发现这些人是安全部队的内部人士。

我还向两位通报人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对安全理事会支持与东道国合作、特别是在保护平民方面的合作有什么期待？

就此我想说的另一点意见是，安全理事会要求维和人员做到行为模范的同时，也期待接受联合国支助的东道国的安全部队表现出类似的行为举止。这是一项主要要求，在国家局势不稳定或者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时难以达到。法国随时准备为这些国家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帮助它们实现该目标。

最后，东道国与维持和平行动之间的合作可能涉及帮助强化东道国的安全和国防部队，特别是在人员培训和装备供给方面。因而，目的是把保护的责任交给安全和国防部队，以便东道国有能力充分确保平民的安全。

在此，我谨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在安全和国防部队的能力建设方面，我们可以集体探索哪些选择，以加强部队与东道国之间的合作？我们常常被告知，一旦东道国的国防和安全部队全面运作起来，联合国部队就可以撤出。

伊波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也赞扬已故的弗朗西斯•维布-桑齐里少将，他当之无愧。我们向他的家人、加纳政府及人民以及联合国表示诚挚慰问。

现在谈谈我们今天开会讨论的问题。我谨欢迎召开本次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军事部分领导人的互动和内容详尽的年度会议。我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伦纳德•姆里乌基•恩贡迪中将和Cheryl Pearce少将富于启发、极有助益的通报。

维和特派团同东道国合作的问题是一个对于我国代表团尤其重要的问题。的确，我国最近的历史彰显出同整个联合国系统堪称典范的合作，这种合作充当了推动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取得成功的催化剂。

众所周知，维和行动意在支持而非代替东道国当局，是在包容与可信的政治进程基础上摆脱危机的战略的一部分。在这方面，联科行动的经验让我们充分看到：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同东道国当局互信和追求双方商定目标的基础上，开展动态合作至关重要。它为成功过渡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持久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

维和特派团的军事部分是这种合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东道国政府的模范协作有赖于后者在联合国的各项行动中发挥有力的本国主导作用，确保地方当局参与维和特派团的各项主要任务。联科行动和科特迪瓦政府就曾一道努力，加强对平民的保护，做法包括：打击侵犯人权行为和性别暴力，主导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改革安全部门，以及推进民族和解进程。

此刻，我谨向恩贡迪中将讨教对以下问题的看法。

他对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特派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与苏丹当局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保护受武装团体所实施暴力影响地区的平民或遏阻部族暴力方面的合作有何评估？目前政治环境的标志是过渡军事委员会与来自受影响社会政治阶层的示威者之间的紧张状况，这是否会影响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与苏丹当局之间的关系？苏丹目前社会政治局势可能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重组和部队缩编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促进民族和解的举措是建设和平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在当地不同族群之间存在深刻怨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更具体地说，关于塞浦路斯局势，联塞部队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当地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解？

关于对性暴力的零容忍政策，我谨寻求澄清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塞部队框架内为确保其部队行为堪称典范而采取的行动。

最后，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并鼓励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塞部队指挥官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在特别艰难的部署环境中，尽管受到诸多限制，他们仍在进行出色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要赞扬联合国各特派团军事和警务部门数以千计男女人员，并向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献出生命的士兵致敬。

吴海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感谢你召集今天的会议，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及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混合特派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两位司令所作的通报。我愿通过你们向部署在联合国14个维和特派团的军事人员致敬。

根据主席的建议，我今天的发言首先简要地阐述一下中方对维和行动的看法，之后向两位司令员提两个问题。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为帮助当事国稳定局势、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总体肯定。为进一

步加强维和特派团履行安理会赋予的职责，深化同有关当事国的合作，中方愿分享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尊重东道国主权和主导权。

第二，要重视同当事国、当事方沟通，赢得有关方面的信任。在部署各阶段，维和行动要同当事国确保沟通渠道畅通，及时通过协商处理有关问题。

第三，要重视帮助当事国建立健全国家机制，提高当事国“造血”功能。维和行动要重视加强当事国的能力建设，在条件允许、当事国提出要求时，帮助其建立健全国家机制。

下面我想向两位司令员问两个问题。第一，维和行动以政治解决为优先，请问两位司令，结合你们的工作，你们认为，特派团的授权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调整？第二，为加强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两个特派团同当事国开展了哪些合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赞扬你召开本次辩论会。在举行最简短和最具互动性的通报会方面，你一直非常成功。

德国谨向部署在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士兵和警察致敬，并肯定他们的行动、成就以及他们往往必须作出的牺牲。

谈到谢丽尔·皮尔斯少将，那些不是每天都关注塞浦路斯境内事态发展的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即那里的局势相当平静。她有益地指出，违约行为有所增多，双方立场趋于强硬，这对塞浦路斯总体局势肯定有影响。她特别提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在缓冲区的权威受到质疑。有鉴于此，还可以再做些什么来重建或加强该特派团的权威？从内部，也许与秘书长或拉克鲁瓦先生一起，可以做些什么？也许她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内部烹饪”的秘诀。此外，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现在来谈苏丹局势，我想没有任何人认为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我谨赞扬伦纳德·穆柳基·恩贡迪中将作了颇为确切和中肯的通报。我从他的发言中了解到，他认为这一局势令人担忧。我还了解到，没有按照任务授权设想将队部移交给平民，而是有一项由过渡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要求将队部移交给快速支援部队。我们都知道，快速支援部队以前被称为金戈威德，对达尔富尔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负有责任。

中将提到有队部遭抢劫，并说苏丹政府没有履行准入义务。此外，他说，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冲突的主要根源性问题，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我当然聆听了有关人士的表态，他们说，维和行动与当局保持良好关系极为重要，而且东道国当局负有保护平民的主要义务。那么，面临的挑战就是，如果当局不履行义务，那该怎么办？两周前，在喀土穆，当局对100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有人再次使用性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在当局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时，该怎么办？

我想问中将，如果我们继续进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缩编——这是在天气晴朗时作出的决定——他预计会出现什么军事后果？当快速支援部队按照过渡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接管队部时，预计会出现什么后果？他能跟我们讲一讲有关他在实地经历的情况吗？当地非洲人如何接受快速支援部队？他预计达尔富尔会再次爆发冲突吗？也许他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过去一周以来达尔富尔局势的情况。

最后，我想补充一下我的秘鲁同事就性暴力所说的话。两周前，我们再次目睹喀土穆有人使用性暴力。喀土穆不再是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行动区，但是，中将能否跟我们讲一讲有关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仍在运作地区内的性暴力情况？能够做些什么？

恩贡迪中将为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一直在采取哪些行动？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位通报人今天的通报。

我们对弗朗西斯·维布-桑齐里少将去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不可否认，维持和平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它是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工具。和平行动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因此涉及几个领域。我们必须强调，特派团必须严格遵守维持和平的基本支柱：冲突各方的同意、公正和不使用武力，除非是合法自卫和维护任务。东道国的同意是有效履行特派团任务的关键。有时，我们看到有人采用一些办法，阻碍和影响任务活动的绩效或拖延特派团必须支持的政治进程。

我们感谢恩贡迪中将的通报，并关切地注意到苏丹近期的政治事态发展可能对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产生的影响。这种事态发展的特点是，苏丹与特派团缺少合作。为了成功撤出，需要东道国与和平特派团密切合作，并允许特派团向该国有效移交责任。在苏丹，需要一个由文官领导、包容、透明的政治进程，以便恢复民主秩序和善治。这将确保该国致力于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密切合作，并执行拟议的撤出战略。这种合作将使特派团和该国都能拥有移交责任所需的工具。

我国代表团谨借此机会表达以下关切。

第一点关于与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族群合作。对于我们如何加强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以确保与各族群——尤其还有青年和妇女——更加密切地合作，他们有何想法？第二，我们肯定部署在高风险特派团的维和人员发挥的关键作用。要作出这种牺牲，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以使人员具备相应技能，这些技能要让他们能够有所成长，从而确保在实地有高效、有效的表现。在这方面，目前考虑采取哪些额外措施或方案来加强维和人员部署前的培训，以确保他们在履行职能和有效完成任务时的最佳表现？

维和人员接受性别问题培训十分重要，为此需要部署性别平等问题顾问和妇女保护顾问，并加强对维和人员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政策。

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我们注意到侵入缓冲区的行为仍在继续，这违反了第2453（2019）号决议。部队指挥官们认为还能采取哪些其他预防措施，以减少这类违反行为？

最后，我们要重申，和平特派团是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的重要工具，只有意志坚定、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成功实现持久和平。

范沙尔克维克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恩贡迪中将的通报。今天很高兴看到一位非洲兄弟向我们发言。我也谨感谢皮尔斯少将的通报。

一些参与维和的男男女女在维护和平、帮助各族群和社会实现和平并找到前进道路的工作中牺牲了生命，我也要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们赞赏他们的牺牲，并承认维和人员困难的工作环境及其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挑战。

我国代表团谨重申维持和平的重要性，因为它是联合国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工具之一。通报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在这里作无稿发言并回答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正如我们以前在安理会所说，我们仍然认为，特别是对于今天在此代表苏丹人民和塞浦路斯人民的两个特派团而言，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在于这些族群本身。我们认为，维和行动创造了一种环境，帮助他们寻找他们必须找到的和平。如果我们能从同事口中了解到，他们是否认为这种方法会在具体特派团中发挥积极作用，就会很有帮助。我们指的

是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缩编和撤出。我们很有兴趣听取恩贡迪中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关于塞浦路斯，这是我们运作时间最长的维持和平特派团之一。这是一个我们认为“一切照旧”的特派团。众所周知，问题并非总是那么简单。听听她的看法很有好处。

关于三方合作已经谈了很多。我们想听我们各位通报人谈一谈三方合作的价值。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总是要就其重要性发表意见。我们能否举一个实际例子，说明这两个特派团如何运作？因为它们是非常不同的。

作为安理会的非洲成员，苏丹局势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也十分了解目前面临的行动和财政挑战。供资始终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确保工作成功、维和人员的安全和维和行动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的是，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要确保已取得的成果不会逆转。部队指挥官们可能很清楚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就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缩编作出的决定，也很清楚目前提出的一些关切，尤其包括不留下真空期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成员提到的移交队部问题。要如何处理这类情况——特别是在涉及东道国同意与否的问题上，如果某个决定违背了原来的意见，比如将队部转为民用一事，该如何处理？如何处理这类情况？需要安理会的哪些援助？

我们要象刚才那样对人员死亡表示哀悼。然而，存在一种趋势。我们认为，在维和人员的安全保障方面，他们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危险。恩贡迪中将认为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我们需要什么来加强他们的安全保障？是技术还是装备？我们知道各种局势的危险程度不同，不过，他对我们如何努力遏制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和袭击维和人员行为有什么看法？

就谢丽尔·皮尔斯少将而言，南非是维和行动中妇女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她，特别是作为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由于围绕主席要求我们重点关注的主题的大多数其他问题，已经有人提出，我冒昧地要求从她的角度介绍女性军警人员，特别是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妇女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职位由妇女来担任。我们对自己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自豪，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部队干预旅方面。如果她能介绍这方面的一些看法，我们将不胜感激。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介绍印度尼西亚对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的看法。之后，我们将向两位部队指挥官提出问题。我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部队指挥官的全面通报，他们的通报侧重于与东道国的合作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当前任务面临的行动挑战。我还要向弗朗西斯·维布-桑齐里少将的家人和全球所有维和人员表示慰问。

征得同意的确是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核心原则之一。没有东道国政府的同意和合作，维持和平特派团就无法部署。事实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行动，这是维持和平行动议程及其《共同承诺宣言》的组成部分，以加强东道国的同意与合作。

第一项行动是维和利益攸关方之间加强就任务授权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协商。我们需要集体履行关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三角合作的现有政府间承诺。我们还需要考虑东道国政府和安全理事会进一步直接接触的备选方案。这应包括就执行安全理事会任务方面开展的合作，包括便利准入，并承认与维和人员安全保障有关的国家责任。

第二项行动涉及维持和平行动对保护平民的贡献。我国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特遣队的亲身经历表明，速效项目、社区参与、调解和协作以及与东道国政府密切合作，对于改善保护平民的任务至关重要。

第三项行动是为特派团领导人提供更好的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处理与东道国同意和合作有关的问

题。特派团领导人需要在会员国和区域组织的协助下，通过所有变动，保持东道国政府对应方的同意与合作。我认为，管理东道国的同意与合作，是特派团领导人工作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部分。

第四项行动是确保特派团拥有管理东道国同意与合作的正确工具。在这方面，需要有可能的指导方针来引导与东道国政府的合作。这些准则可以概述维和人员所面临不同的同意情景、应对方案和确定同意发生严重恶化的标准。当需要在局势沦为危机之前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时，这些工具将非常重要。

我要再次感谢并赞扬部队指挥官的模范承诺。印度尼西亚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大部队/警察派遣国之一，将始终支持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无论是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塞部队还是在全球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内，都是如此。

最后，我想向两位部队指挥官提几个问题。根据他们谈到的看法，我想问他们以下几点。所谓的“圣诞树”任务对维持和平特派团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具体影响?

我想再问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指挥官两个问题。实现负责任的缩编和撤离战略面临哪些挑战?安全理事会应该做些什么，来确保制定的下一个任务得到明确阐述并符合业务挑战?

我想问联塞部队指挥官以下问题。就目前的任务授权而言，为了确保联塞部队能够支持实现政治解决并改善与东道国的合作，应该作出哪些改进?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拉克鲁瓦先生、恩贡迪中将和皮尔斯少将的通报。我不打算宣读发言全文，因为它与我们已经听到的发言非常相似。我将侧重于涉及非洲的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强调维持和平行动在联合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许多冲突之后，它们在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们面临严峻挑战。我认为，安理会的任务之一是寻求精简维持和平行动的方法，以确保它们更加有效。当然，发言者提到东道国、维和行动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的同意的重要性，这些对取得成功都非常重要。

然而，我想重点谈谈利用联合国的财政支持来资助非洲行动的问题。我认为，对我们非洲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安理会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可以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我们非洲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的环境，而非洲是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大多数冲突发生的地方。我们的许多合作伙伴——其中许多人在这个会议厅里——以及联合国本身拥有我们非洲人需要的资源，能够处理困扰我们的问题并解决冲突。

在这方面，我想提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多地是针对拉克鲁瓦先生的，因为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筹资有关。他是否认为合作伙伴和联合国的这种资助可以确保非洲的维持和平行动更加有效?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鉴于和两个不同族群打交道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我想知道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是什么。

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特派团取得成功，安全理事会应该做些什么，以确保任务授权不经过修改而得到充分执行?

最后，我想知道——我不知道在我到达之前是否有人提了这个问题——如果当地居民对实际上驻扎在他们国家的部队怀有敌意，那么，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我们正在审议的两个案例，是否有任何促进和解的方案，包括在这种复杂局势中改善共存关系方面，是否有任何建立信任的措施?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向在实地在联合国旗帜下为联合国价

值观服务的男女致敬。为了感谢他们，安全理事会理应继续开展自己的“以行动促维和”的工作。

今天，我想提几个问题，并强调两点：第一，我们有责任支持政治进程，第二，维和行动寻求提高自身的绩效。

首先，我要申明我们致力于聚焦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我看到有很多方式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首先，维持和平行动必须是发展变化的，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适。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不考虑当前喀土穆政治事态发展的情况下寻求撤军是不现实的。在这方面，如果恩贡迪中将能与我们分享他对这个具体问题的评估，我将不胜感激。

其次，只有通过明确、可理解、毫不含糊且前后一致的任务授权，特派团才能完成任务。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两位部队指挥官：安理会如何才能让任务授权更明确?

第三，关于提供适当的任务授权和充足的资源，比利时迫切希望确保向联合国特派团提供充足的资源。

我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业绩。特派团的业绩是提高当地民众对其认可度的关键，也是保证警察和部队派遣国再次承诺的关键。业绩高效符合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在业绩方面，东道国既是一个关键参与者，也是主要受益方。

不过，业绩不仅仅取决于部队足够的能力和培训，还取决于联合国特派团如何运作，在与军事部分必要的指挥控制关系之外利用其能力。我们所说的是所有能力和人员的部署方式以及所谓的特派团综合职能。在这方面，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两位部队指挥官。他们如何看待各自特派团的整合问题?

最后，特派团的业绩还涉及特派团内部人员。我们很高兴听到谢丽尔·皮尔斯少将今天的发言，我们赞扬秘书处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就性别平等问题采取的行动，这使该特派团在领导方面成为性别平等的典范。皮尔斯少将对联塞部队的这个层面有何感想?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恩贡迪中将和皮尔斯少将的通报。我们欢迎他们与我们一起参加本次会议和当前进行之中的对话。我们对两位部队指挥官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深表感谢，并向那些为和平牺牲生命的同事表示敬意。

我们可能不是定期派遣部队的国家之一。不过，在科威特境内曾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长达10年多，我们充分认识到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要性。当然，我指的是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伊科观察团），这是特派团成功的范例。

我要感谢会员国同意本次会议采用彼此互动对话的形式。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将着重谈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最佳做法；第二，加强合作的举措；第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合作。

自设立首项维持和平行动至今已有70多年。我们现在已掌握大量最佳做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维和的三项原则，包括最重要的政治解决和国家所有权。

第一项维和原则是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和批准。特派团与东道国之间的持续沟通有助于执行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在争端爆发前化解争端。此外，在政治解决至上的基础上设计的特派团有助于通过强大的国家机构来促进国家所有权，东道国可以利用这些机构来履行其主要保护责任。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方法在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海地取得了成功。

关于加强合作的举措，我们听取了通报人介绍的一些合作的例子。我们回顾我们本国充当伊科观察团东道国12年多并分担重任的经验。我们谨指出一些值得称赞且需要效仿的举措。

我们感谢科特迪瓦对本议题的关注，在今天的会议之前举行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会议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还赞扬开罗路线图提出三边合作的概念，并通过纳入东道国的视角将其变为四方协商。

事先与东道国协调并确保其参与起草设立或修改特派团的决议不是时有时无的要求，而是一种必须，因为这些国家是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的一部分。此外，维和人员必须接受必要的培训，包括纪律方面的事项以及语言培训。负有这项责任的不仅是特派团，东道国也有责任从特派团设立开始一直到其离开持续地遵守协议。我们感谢苏丹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与两个特派团开展合作。

有很多问题是向通报人提出的。这就是我在结束发言之前只提出一个一般性问题的原因。安全理事会负责设计特派团，而在外地的人员负责执行。这是一个向通报人咨询任何建议的机会，特别是双方在过渡时期存在分歧时。在当事双方在过渡时期存在分歧时，通报人会可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什么行动建议呢？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想请通报人来回答成员提出的问题，并发表进一步的意见。

我请拉克鲁瓦先生发言。

拉克鲁瓦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将作非常简短的发言。我当然不想把讨论变成主要是安全理事会与我本人之间的讨论。大多数问题是向我的同事即两位部队指挥官提出的，他们将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有人向我提出了关于非洲维和行动的资金筹措问题。我认为这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确保联合国在非洲的行动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其任务授权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简单讲有三点。

第一，我们致力于继续努力提高效率和充分利用所提供的资源。我们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继续这么做。

第二，我们需要有充足的资源，以便在非常具有挑战性和非常困难的环境中继续执行我们的任务，我认为本会议桌周围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

第三，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的和平行动可能会面临可能涉及经费问题的意外情况。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即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支持应对埃博拉疫情所带来的挑战，这导致联刚稳定团在后勤支助方面动用大量资源，使用我们的安保人员、警察和军队为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同事提供支助，而且联刚稳定团还将若干其他资源用于这方面的支助，包括我们的一些同事，特别是在决定加大应对布滕博地区埃博拉疫情的力度之后。这只是意外情况影响维持和平行动所需财政资源的一个例子。

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为非洲的行动筹资。安理会无疑知道，秘书长经常表达的立场是，支持为这些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财政资源，我们认为此种资源是这些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我想在此重申这一立场。

关于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问题，我想说，这一维持和平的关键原则仍然完全有效，我们有责任寻求与东道国政府的最佳互动与合作。有时候这很有挑战性。我们的部队指挥官和特派团团长为解决与许可或行动自由有关的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升级处理这些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有时会这样做，因为有些问题需要东道国政府代表参与解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安理会的支持，以确保我们遇到的任何困难都能得到解决。我要强调，确保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尽可能顺利的合作和互动是我们特派团的最高优先事项。

此外还提到了业绩问题。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们目前为提高业绩所做的努力。这是一项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建立各种业绩评估机制，包括军事单位和警察单位的业绩制度，以及对我们认为业绩没有达到预期的案例进行系统调查。我们现在有系统

地调查这些案例，我认为这导致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和有益的改进。

此外还提出了任务的优先次序问题。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安理会把重点放在我们任务的关键优先事项上，但这些优先事项正在演变，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曾经认为延长任务期限是一种例行程序的情况已经不再适用。所有特派团或多或少都处于过渡状态。在这方面，我要补充两点意见。第一点是，确定任务的优先次序也是我们作为联合国的责任，因为我们向安理会提出应该充分排定优先次序的建议。第二，我们的特派团希望安理会决定其任务，以便将它们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用于执行这些优先事项。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需要不断改变行动，并注意让其结构不断演变。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致力于继续努力，普遍强化妇女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和地位，包括在我们军事单位和文职部门高级领导层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趋势令人鼓舞，但我们肯定会做出更多努力。

最后，关于维和人员的安全保障，我们也致力于继续执行我们旨在改善这方面工作的专门计划。去年我们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敌对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有所减少，今年迄今只有一个特派团有人因敌对攻击而死亡。我们认识到必须做更多的工作，这与培训、装备、绩效和医疗支援有关。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拉克鲁瓦先生所作的澄清。

我现在请恩贡迪中将回答问题并作评论。

恩贡迪中将（*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发言者和安理会成员的美言和赞扬。我们感谢今天听到的鼓励。

提出的问题很多。我认为，安理会成员花时间提出问题，如果我不对所有问题作出答复，这对安理会成员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将努力回答向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首先，关于波兰代表提出问题，即当前任务是否允许我们务实地开展工作，简短回答：是。我提到的作为任务主要问题的四个方面非常清楚，运作良好，但政治支柱除外，因为目前的政治局势，政治支柱已经停滞不前。其余方面进展顺利。在访问整个地区，特别是由武装运动控制的有限地区时，拒绝通行的问题是阻碍全面执行任务的唯一领域。因此，我的回答是，第2429（2018）号决议概述的当前任务确实可以务实地执行。

喀土穆局势确实对在达尔富尔的行动产生一些影响，但不如在其他地区那样大。这是因为，无论喀土穆发生什么情况，达尔富尔都有支持政府和支持反对派的人。因此，它确实产生了影响，鉴于政府的军事化和国家由军人管理这一事实，现在更是如此，这造成了与民众本身管理的脱节，我们认为这在该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于暂停移交营地，我们撤出的是我们自己的营地。我相信这是会解决的。根据我从过渡军事委员会所说的话中收集到的信息，快速支援部队接管的营地将被分配给社区供平民使用，而不是留给快速支援部队。因此，我认为暂停只是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时间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因为特派团本身对所颁布法令的反应，也是因为国际社会，包括总部对该法令的反应。

谈到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关于改革的影响和我们在实地看到的情况问题，我说，资源和决策权力下放总是好的。它便于我们利用自己的资源运作并作出决定。

至于我们可以从朱奈纳掠夺事件中吸取的教训，那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但朱奈纳事件令人遗憾，因为实务科早在2018年12月1日就停止了在朱奈纳的业务，因此该设施一直留在那里，没有人与社区合作。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各组成部分的实

务科室目前与各社区合作。根据看到队部移交给军警人员使其受益的经验，我倾向于认为他们也从中受益。

最后，正如我所说的，政府军事化致使将国家领导权交给了穿制服的军官，他们可能没有必要的沟通渠道向民众解释，如果让这些队部保持原样并移交，它们是有用处的。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我们已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尽全力保护自己，然后再进行接触。我们不应该再次脱离社区了。民政和法治人员以及所有其他接触并教育社区以使其了解我们在那里驻留的有益目的的部门，必须与社区和政府接触（它们正在这样做），让它们了解其在确保该地区和平与秩序方面的主要责任，以便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谈到秘鲁代表提出的侵犯人权问题，这是一项重大挑战。我们的优先事项是提高法治和人权能力，特别是在监测该国境内人权问题方面，更重要的是向人民和政府进行有关确保法律和秩序以及尊重人权的能力的教育。尤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苏丹是一个广阔的地区，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将国家权力扩大到所有人民以及负责法治和维护秩序与正义的机构。

最后，关于发展，虽然它不是维持和平的直接组成部分，但达尔富尔的贫困对侵权事件有直接影响，因为当人们在全国缺乏适当治理的情况下为生计而挣扎，不得不争夺资源时，这种侵权事件就会发生，而所有这一切又因武器扩散和武器落入坏人手中而加剧。这就是使局势变得特别困难的原因。

谈到俄罗斯代表提出的权力和平过渡问题，这一过渡的安排相当详细。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国家联络职能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和平的过渡，并且正在尽可能在实地进行。就我们的安全而言，确实可以从多斯桑托斯•克鲁斯中将关于“改善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的报告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我应该说，苏丹局势比其它地区的局势稍微好一点，因为政府一直控制着该地区，并且与其他特派团不同，我们没有看到对特派团本身的蓄意攻击。政府完全控制着该地区，聚集的武装分子很难在不被政府辨认出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营地发动袭击。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民众自己想抢劫。我们已经说明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并在每个队部部署了足够数量的部队，以确保我们能够做任何必要的事情。

关于美国代表提出的问题，过渡军事委员会已表示将撤销其法令，尽管尚未收到相关的正式函文。问题是我们如何从那里着手进行。从一开始就与当局商定，队部将供民用。我们与社区和除警察以外的其它非安全政府机构合作，对谁将接管这些队部供平民使用有所了解。一旦我们能够确保队部将使其所在社区获益，并能为社区，包括大学、理工学院、医院及社区所想到的任何其它设施所用，这一点将重新摆到桌面上讨论。虽然我们应该把这些空间归还给政府（因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最初是从政府那里得到这些空间的），但作出的安排是，这些空间将归还给社区而不是军警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对该法令提出质疑的原因，这样我们才能回到原点。

法国代表问，安全理事会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加强合作方面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要确保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政府及其当局双方尊重任务授权和部队地位协定。就这么简单。正如我所说，这种合作有两个基本要素——信任和政治意愿。我们需要这一点来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完成，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帮助的地方。

关于该地区维和人员的行为，这一使命一直是完美无缺的。例如，在过去四年里，我们没有一项关于军警人员性剥削或性虐待的指控，这是非常好的。

关于科特迪瓦代表提出的问题，正如我在通报中所说的那样，在与当局就武装团体控制下的地区内武装团体问题进行合作方面，这是民众因受拒绝

准入影响而无法受益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所提供的服务的唯一一个地区。武装团体所在地区目前有限并受到遏制。拒绝准入的规定曾有一次例外。当去年9月该地区发生滑坡时，政府允许我们进入该地区，以帮助滑坡受害者。理由是，由于我们既不是苏丹解放军的敌人，也不是政府的敌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维和人员应该被允许毫无问题地去任何地方，因为我们谈判和会谈时都是中立的。

中国代表问，为了确保我们成功，我们应该对任务规定做出什么改变。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唯一的问题涉及政治支柱，由于当前的政治局势以及我们是否必须在这个支柱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撤离，这一问题并不十分清楚。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安排，使我们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这一支柱问题。据我所见，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我坦诚地认为将达尔富尔问题作为整个苏丹局势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地加以考虑会更好，但这要由苏丹人民来决定。目前就我们的任务而言，这是我们唯一看不到明确方向的领域。我们让安全理事会决定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如何推进这一支柱。

德国代表提出几点重要事项，首先，向快速支援部队移交队部的可能性是我们将要探讨的一件事，但是不会这样做。快速支援部队有两个方面。有些地方的民众自己说，最好有这些部队，因为它维持和平，保护这些民众免遭特定地区武装团体的影响。因此，他们觉得，在有些地方，快速支援部队有利于民众，受到民众的拥护，因为这些部队保护民众，特别是务农群体，因为这些群体没有自己的武器，但是同时，也有游牧群体四处流转，而且确实拥有武器。务农者对快速支援部队在某些地区的存在感到放心，因为这意味着那里将不会有任何携带武器的人员。另一方面，根据快速支援部队的历史，一些民众对他们感到不太舒服。

有可能发生新的冲突吗？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该问题。我关切的是，有政治图谋的武装团体暨苏丹解放军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导致某种军事威胁。这些冲突是有可能的，而且不时爆发。另一方面是盗匪活动，如到处发生的盗牛、劫掠和犯罪行为。随着缩编的进行，这些冲突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盗匪行为同样如此。如果没有法治与治理，这些犯罪都有可能继续。苏丹解放军同政府之间也有可能发生冲突，但是将会局限于杰贝勒马拉的某个地区。

关于总体性侵害和侵犯人权问题，我认为，建立这方面的人权监测能力十分重要。

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提到与青年和大众协作的问题，我同意，这种协作非常重要。我先前说过，我们开始缩编时，旨在与民众、包括特别是民间社会互动的那些部分大多被裁撤。与包括青年在内的民众互动、推行改善其生计的能力建设措施非常重要。治理司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良好的工作。就军队而言，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做的是对部队进行各种交叉领域的培训，这在诸如性别和人权问题等领域非常重要，以便当部队位于文职部分无法同行的较偏远地区时，仍然能够宣传倡导民间社会、性别平等、人权以及任何其它可帮助社区的问题。这是可以与会员国商讨的一件事，以确保它们的部队在部署到任务区之前在这些问题上接受良好培训。

南非代表询问我们在移交队部时是否会留下真空。我想再说一遍，我已经讨论过队部的问题。

关于维和人员的安全，克鲁斯报告对我们一直很重要。正如拉克鲁瓦先生说过的那样，为和平行动部提供充足资源，以确保它能够发挥职能非常重要。我只想说，如果到了看似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可取代政府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撤出、让该国自主领导的时候。

印度尼西亚代表询问，我们认为存在什么挑战，我们需要什么以进行负责任的缩编。我想，对我们军警人员来说，任务授权一直是清晰的。我们听从指令，并加以执行。我们从缩编一开始就是负责任地进行的。我们对此一直很明确。我们从和平的地区开始，现在剩下的是有问题的地区，尽管在其外围并无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政治解决而非军事

解决的问题。正如我在通报中说过的那样，三方协调机制邀请各方、包括各武装运动坐到桌前会谈，但是，其中一个运动始终未下定决心。把各方召集在桌前是一个需要政治努力的领域，因为一切事宜必须通过对话厘清，今后的道路必须由各方商定。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但是就缩编而言，我认为，它始终是负责任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在特派团已缩编的地区没有看到敌对行动复发。我认为，尽管到最后阶段，缩编仍将负责任地进行，并将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外交努力的支持，以确保民众就本国的前途达成一致。

赤道几内亚代表问到深入社区内部的维和部队，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军警部队不具备民政等其它领域的技能。他们更关心人身安全。但是，作为特派团，我们与文职部分和其它领域的专家是一个整体，一道努力，以便我们在各领域与社区和政府协作。这种协作应该继续，从而确保社区参与其中，并且清楚地了解为其自身的生存与福祉需要在各方面做些什么。

比利时代表问到在政治上不成功—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撤出的问题。根据我的评估，政治支柱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停滞，应该迅速启动。在这方面，当前局势具有一定挑战性，必须开展工作。在此外的其它方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各组成部分整合良好。我们采取一种统筹的做法来处理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大家从领导层到战术一级，均在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尽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不得不说，自缩编启动以来，一些文职人员及其有用的服务被终止，我们真的非常想念他们，特别是民政工作人员，他们在社区实地拥有耳目。

最后，我来谈一下关于双方存在分歧时我们怎么做的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双方是指冲突双方。我想强调最重要的方面，即：对话与外交努力，因为正是通过外交努力，人们坐在一起，讨论今后的方向，才达成最后的解决。政治对话、达成一致以及携手并肩至关重要。造成问题的是民众自己，也正是这些人能够坐在一起、开展对话、商定未来的方向，从而解决问题，这是化解各种问题的方式。因此，当各方之间有分歧时，应该互相沟通，讨论不同观点，共同努力直至达成协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皮尔斯少将发言，回答各位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皮尔斯少将（*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成员对我们维和努力的溢美之词，我们对此深表谢意。我将根据我的理解回答我所听到的所有问题。若对问题的理解有误，敬请成员们予以纠正。有些回答实际上与我作为部队指挥官的立场一致，有些则更多的是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秘书长特别代表将在一个月内来到安理会，我将作一些评论，但将把我认为特别代表能够更好地回答的问题留给她来答复。

关于波兰代表提出的现有任务规定是否运行良好及我们的方法是什么这一问题，根据现有的任务规定，我们能够支持特派团和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政治结果。在缓冲区，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做法。我们现在拥有一支只有800多人的小部队。我们充分致力于通过一个有力的巡逻和联络沟通方案执行缓和缓冲区内紧张这一任务。

我们面对的障碍实际上是双重的。正如我在先前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这涉及对我们在缓冲区内的授权权力缺乏尊重，以及双方均不承认或接受2018年备忘录。当我们缺乏作业基础时，进行沟通和接触的环境非常不稳定和困难。

关于移徙问题，我们采用联合国整体做法处理塞浦路斯境内的移徙问题。过去六个月来，抵达塞浦路斯申请和寻求庇护的人数持续增加。按人均计算，塞浦路斯仍然是欧盟成员国中申请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从北方进入塞岛的新移民主要是来自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叙利亚国民，而非洲裔人则源源不断地作为学生或求职者从南方入境，且人数不断增加。

我们记录到的实际到达缓冲区的人数较少，因为塞岛西部仅有一小块地区可乘船进入。但是，贯

穿塞岛的各种走私路线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使用。缓冲区边界鬆懈，我们没有足够力量能够承担阻止非正常移徙的责任。尽管如此，我们正与双方密切合作，以解决该问题，并寻找机会协助那些通过缓冲区的人以及那些不得不返回原籍国的人。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问题。关于对当地及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影响，我真心欢迎有针对性的架构，这种结构使我们能够协调我们目前在塞浦路斯境内开展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绩效措施、我们现在实施的特派团构想和我们今年正在建立和试验的绩效综合考核制度来监督部队业绩；确保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及确保我们现在开展的培训与“以行动促维和”倡议的结果相一致，并且如果发现差距，使我们能够集中解决。

关于绩效，除采用自上而下的做法外，我们当然也通过各部门进行沟通。我们有长期部队派遣国的承诺，与部队派遣国的这层关系确保为培训工作提供迅速反馈;我们看到新到人员表现优秀、培训得当；如果存在差距，我们有机会开展特派团培训，解决差距。

授权机制当然是一项正在开展的工作，秘书长特别代表将更详细地谈这项工作。过去没有在塞浦路斯建立机制的概念，我们正试图从头开始。有些方面的工作速度比其他方面快，秘书长特别代表已与双方一道做了不少工作，以确定我们可以推进的机制。下个月特别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时将说明这种融洽关系，因此我把这一问题留给她作进一步说明。

回答秘鲁代表提出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民事、军事和警务层面努力在政治上建立信任机制。因此，这方面的许多措施正纳入军事和警务部门。对我们而言，这涉及排雷和可疑危险区。我们无疑正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并期待在明年初完成工作。

关于开展社区工作，我们认为，自下而上的方法和塞岛两族接触，以建立两族，即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之间的信任，将有助于我们成功地找到前进方向。这是全特派团的做法，我们作为军事组成部分，与民政科、联合国警察及政治组成部分密切合作，在不同层面解决这一问题。

回答俄罗斯代表提出的问题，我已经提及和谈到由前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卡洛斯•艾伯特•多斯桑托斯•克鲁兹中将执笔的题为《提高　高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的报告。我们认真对待业绩问题。在特派团的各项工作中，培训和安全无疑是我的首要优先事项。这已在我们的特派团构想中加以阐述;我们有部队工作计划、绩效综合评估制度和“以行动促维和”倡议成果，以及我本人的行动构想和部队优先事项。我们有持续评估，及前面所述的迅速反馈环路，今后我们将继续审核、分析和实施这些措施。

我感谢美国代表提出的问题。关于在塞岛各地行动自由的问题，我们确实非常幸运地享有在塞岛各地行动的自由。对塞岛北部停火线沿线几个地区有争议。在那里，行动自由有时受到质疑。目前，我正在与这些有争议地区的对立双方部队指挥官密切合作，争取缓和局势，以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取得政治成果。我注意到联合国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有些做法肯定是周期性的。为了理解对立部队的立场，与政治成果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关于美国代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东道国同意及其对缓冲区的看法问题，双方观点完全不同。希族塞人认为，缓冲区属于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尽管我们拥有法定授权，他们鼓励希族塞人平民在缓冲区开展活动；而土族部队则认为缓冲区应该是一个保持现状的地区，直到其地位作为解决和领土调整协定的一部分得到确定。因此产生紧张，双方对缓冲区的立场认识有分歧。不接受甚至不阅读和承认备忘录，真的难以解决该问题。我们的行动没有“道路规则”可遵循，因此必然在北部停火线附近、在我们与土族部队、农民与土族部队，以及我们与农民之间产生紧张。

我感谢法国代表提出的问题。关于内部和外部的战略和行动反馈，作为一个小型特派团，我们非

常幸运，我们能够以真正综合的方式开展工作，而且政治上的细微差别、以及我们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所做的工作都具有政治影响。作为一名指挥官，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到实地发生小规模和我认为非常具有战术意义的事件，具有政治影响。我很惊讶，但现在我对我的工作环境有了更好的理解，我可以在战术上从实地的较小层面理解这些紧张局势及其对双方的含义。安理会通过我们在过去六个月里所作的一些报告看到了这一点。

至于法国代表有关部队地位协定方面行动自由的第二个问题，正如我指出的那样，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关切。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行动的自由。

我们的任务范围内不包括对平民的保护，因此我不会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对于维和人员的行为，我绝不容忍性剥削和性虐待、绝不容忍我的维和人员任何不可接受的行为。我要求每个人对其在特派团中的行动负责。不仅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而且对整个联合国来说，声誉风险有时与这一事件并不相称，而且对他们在其旗帜下服役的联合国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我知道，部队派遣国也让他们接受最高的标准。

关于科特迪瓦代表所提出有关种族间和解的问题，我们与许多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在两族空间与各族合作。我们设立一个民政部门，我们都在共同努力，不仅在缓冲区沿线和跨越缓冲区的各族间，而且更广泛地在岛屿各地。它正在日益成为缓冲区沿线一个问题的组成部分，而在此之外的许多领域，一切照常。他们并没有真正关注或意识到塞浦路斯问题，因为塞浦路斯问题肯定与他们没有单独的联系。

我们再次表示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态度。我们刚来了一个评估小组，我们一直在寻求这个领域的持续改进。

关于中国代表所提出有关绩效改进的问题，我正在执行一个持续改进计划，无论该计划与部队、我们的培训、我们的安全，还是与我们的参与和联络有关。这是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持续评估。我们如何改进？我们如何能更好地参与？对于为联塞部队派遣部队几十年的部队派遣国而言，一个问题是，自满情绪可能会悄悄地产生。因此，我们确实必须保持专注，以确保培训与特派团持续相关。

我不会直接回应哪些任务领域需要调整的问题。目前存在着与联塞部队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该任务于1964年确立。目前的环境是双方对缓冲区内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在保持缓冲区内的稳定与平静以及维持缓冲区的正常情况方面，我们目前陷于紧张的关系。我说的正常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对希族塞人来说，这意味着缓冲区向农耕开放，这实际上对安全有影响。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任务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我们目前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与东道国接触的问题，我们确认，我们与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有一项部队地位协定。对我本人作为部队指挥官而言，我必须与敌对双方进行接触，我必须保持公正。我必须表现出公正。我必须以敬重的方式与我的两位同事进行积极、诚实和直接的对话，以确保我们能够找到措施，并找到解决令人关切问题的方法，以期缓和这些紧张局势。

现在回应德国代表所提到阵地加固的问题，2018年有关于这方面的几份报告。闭路电视捕捉到了北部停火线阵地和建筑加固的情况。我们在这方面看到很多违规行为，尽管2018年略有减少。阵地还在那里，而且仍然有人驻守。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违规行为实际上发生在有争议的地区，对此我们在联合国和土耳其部队所承认的停火线方面存在分歧。正是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制造了许多违规行为。还有一些农民选择在靠近土耳其部队阵地的地方耕作，这也造成了一些紧张局势，促使来自北方的土耳其部队展开某些行动。

关于安全理事会可以提供什么支持的问题，承认备忘录以及继续支持我们受权的权威，使我们能

够继续努力与双方取得进展，将为我们提供沟通和在缓和环境方面取得进展的基线。

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所提出与各族合作和加强任务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确实强有力的妇女和青年方案。正如我所说，我们正在采取自下而上的两族做法。我们与塞浦路斯境内的外交界积极接触，它们都支持塞浦路斯妇女和青年并增强他们的权能，使他们在教育和政治环境中都有话语权。我们设有一名性别问题顾问，专门负责这一领域的工作。看到缺乏成果有时仍然令人失望，但我们在这一领域将继续坚持下去。

关于处理性别问题的维和人员，我们确实设有性别问题顾问。我也要指出，我们在特派团中有强有力的女性领导，我们继续将重点放在这一领域。不过，我要说的是，必须创造一个包容和多样化的环境，让女性觉得她们可以在与男性同行平等的基础上茁壮成长，并一起工作。然后她们会传播这个信息。我们非常幸运与我们的部队派遣国斯洛伐克和阿根廷合作，它们都没有派遣建制部队。它们派出志愿者。因此，我们有机会在联塞部队内指定、接触并努力增加特派团中的女性人数。

事关话语权。从自己的经验中我知道，口口相传以及对工作环境的了解可以鼓励人们想去某个地方。如果创造了适当的环境，人们会希望来到联塞部队。此外，我们还制定了一项两性均等行动计划，使我们能够让各部门有话语权。这是由我们的女性维和人员所主导的，她们向总部通报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以及应该提供什么资源来创造适当的环境。

我已回应有关侵入缓冲区的问题。该问题实际上涉及在北部停火线附近耕作的农民。他们将继续构成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欧盟补贴有关。他们将继续设法使用更多土地。许可证覆盖的面积约占缓冲区使用面积的20%。我们同意他们去这片区域。缓冲区人员中有80%未经授权。还有无权在那里耕种的土族塞人，造成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升级并形成暴力。我们通过瞄准热点来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并试图通过利用平民领袖和市长，以及通过民政部门将工作交回外交部，来缓和局势。关于反对力量之间相互对抗的问题，这在我担任部队指挥官期间造成的问题不大。

至于南非代表提出的关于族群的问题，我们一贯侧重于我们的两族、两区办法。我们在缓冲区沿线开展族群内部工作，寻找向前推进的机会。双方共同努力，自下而上推动主导权，在这方面哪怕取得些微进展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仍然是秘书长特别代表优先考虑的重点。在缺乏政治对话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的重点是族群主导的机会。在努力创造积极环境，使我们今后能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大进展方面，这些机会将变得十分重要。

关于妇女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符合我已经发表的意见。正如我所说的，挑战在于创造一个包容和多样化的环境，让男子和妇女都能在其中茁壮成长，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我意识到，1995年我刚加入时，正是我们第一年举办综合培训。总之，在这一代际变革中，女性可以填补一些高层领导职位。必须扩大这些机会。这些机会无法带入各级军阶，而是必须从头培养。如果建立起正确的框架，为女性开放贸易和就业机会，并为那些选择成立家庭的人提供某些时间段的兼职工作机会，使她们能够出入军队，就可以培养出一些真正伟大的领导者。可以瞄准一半人口，并且如果方法正确，有许多极具才华的人可以真正使能力倍增。

对我来说，这不是女性捍卫其他女性的问题，而是男性捍卫女性。必须强调的是男性倡导变革的办法。我知道坐在我身后的军事顾问在这一问题上大力倡导变革，并对此十分关注。当然，我认为今后联合国有绝佳的机会，特别是在军事力量方面，我们可以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设定目标，我们将继续实现改进。改进不会很快发生，但是会发生。

我们在较高层面都能理解，但在较低层面，我的重点不是剥夺我们年轻男性或部队中男性的权利。总的来说，女性不想被单独挑出来。她们只想加入并开展工作。我们将来无论怎么做，都必须创造一个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框架内茁壮发展。

关于印度尼西亚代表提出的有关东道国任务中的具体方法以及理解它们如何解读这些方法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关系到备忘录和授权。没有这一点，我们仍将难以取得进展。我们必须缓和紧张局势。目前，用非常口语化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正在玩打地鼠游戏。我们在处理每一个问题。我们积极主动。我们知道哪里会出现热点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每年的问题都一样。我们真的必须找到原因，而不是单单解决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的表征。当前任务中有什么应该改进？我谈到了缓冲区正常状况与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于赤道几内亚代表提出的有关两个不同族群面临的最严重挑战的问题，我们首先从一群塞浦路斯人开始。有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想出解决方案的时间越长，两个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就越大。我们现在看到来自土耳其的永久居民在北部定居。南部有一整个族群。他们如果不在缓冲区沿线，就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双方的教育体系有着不同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族群的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大。

事实上，要努力鼓励这些族群，使它们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建立一个两族、两区的联邦。为此，我们必须极其努力地将这些族群聚集在一起，制定举措，并决定如何与它们沟通。在这方面，制定外联方案和在族群内部建立信任意义重大，但我们必须继续思考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些群体，因为这些群体已经在与我们合作。这关系到寻找新的族群，接触广大社区并鼓励其开展合作。

比利时代表询问安理会可以如何进一步改善适当的资源。安理会成员知道，我们在2017年进行了战略审查。我们已经落实了所有建议。作为部队指挥官，我要说，我拥有执行我那一部分任务所需的最低数量的官兵。联塞部队的力量在于地面部队的数量，即日复一日的巡逻和交战活动、联络和接触。我们存在漏洞，捉襟见肘。在减少联塞部队的资源时，必须考虑改变任务或部队的样子。

关于特派团的表现和社区的接受情况，由于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总是通过积极巡逻与各族群开展积极接触，并正在逐渐与它们建立关系。我们作为长期特派团，一直与这两个族群积极接触，并与所有族群建立起了非常牢固的关系。

关于特派团的整合，我们是一个小型特派团，分三个部门密切合作。我们仍然面临挑战，但通常有可靠的方法。我评估认为，通过综合表现评估系统的任务概念和当前领导层对采取综合办法的重视，我们将在这方面继续改进。

主席先生，关于你提出的有关我们所面临挑战的问题，在维持缓冲区正常状况与实现安全和稳定方面存在任务冲突。我们也必须努力确保不再发生战斗。我们不在那里时出现的真空可能会导致农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得到对立部队的支持，或者肯定会发生在希族塞人农民和土耳其部队成员之间，这也会造成紧张局势。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处于缓冲区，并继续通过我们已经实施的极其强有力的接触计划与对应人员保持接触。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德国代表要求第二次发言。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非常简短地感谢两位指挥官对问题的详细答复以及他们在答复中所反映的对任务的承诺。

我想再次简单谈谈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我有点担心，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缩编问题上，我们过于放任自流。从我听到的部队指挥官面临的挑战来看，我们

知道他和他的官兵能够应付大多数挑战，但这些仍然是挑战。

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挑战也许没有得到充分强调，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喀土穆有了一个新的环境。过渡军事委员会现已掌握控制，强硬的哈姆丹将军成了快速支援部队的负责人。他们决定，应由快速支援部队接管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驻扎点。我认为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我们完全支持部队指挥官有关让大学、医院或民间社会接管队部的计划。但是，将它们作为现在所称的6月3日“喀土穆大屠杀”的负责方快速支援部队的前哨基地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接受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队部今后成为金戈威德后续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队部，金戈威德从一开始就对达尔富尔冲突的爆发负有共同责任。

中午12时35分散会。